

蔣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掙扎

侯鏡如 覃異之 廖運澤

前 言

京沪杭之战，是人民解放軍百万大軍下江南所进行的規模比較大的一次战役，也是蔣介石王朝最后掙扎的一次大战。这一战結束了蔣介石王朝二十二年的血腥統治，因此在历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我們三人都是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又都參加蔣介石这一最后掙扎的大战，那时侯鏡如任蔣軍十七兵团司令，覃異之任蔣軍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廖運澤先后任第七綏靖区及第九編练司令部副司令，又都先后投向人民。茲將我們在这一战役中所見所聞，及从各有关方面所得的資料，綜合写成此篇史料。但我們接觸的範圍有限，所記遺漏和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讀者予以指正补充。又此稿曾蒙李以勳先生核正若干材料，附此致謝。

一 从淮海战役中的滁县指揮所說起

南京卫戍总部滁县指揮所，是負責南京卫戍区长江以北地域指揮任务的单位，所轄地域包括津浦路明光以南、东自江苏的仪征、西至安徽的定远等十余县。指揮所除了一个卫兵連外，沒有固定的建制部队。津浦路蚌埠至浦口段的护路任务，由交警总队担

任，平时不归卫戍总部指挥。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紧张之际，覃异之担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滁县指挥所主任。在此期间，先后归指挥所指挥的部队有：袁英的暂编第七师，罗贤达的六十六军，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杨幹才的二十军等。当时滁县指挥所防区内没有人民解放军，只有江淮军区孙傅家的游击总队。淮海会战愈紧张，江淮军区的游击部队也愈活跃，津浦路蚌埠滁县段的铁路常被破坏，各县地方团队常遭袭击，蒋军东奔西跑，疲于奔命。12月16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召覃异之到国防部，当面指示说：“黄维兵团昨天垮了。刘总司令（刘峙）即由蚌埠移到滁县。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正由无锡开滁县，归你指挥。另外给你交警总队一个团，由你负责掩护刘总部的转移。你可乘飞机到蚌埠走一趟，和刘总司令及李延年兵团（第六兵团）联系后，迅速开始行动。”覃在蚌埠机场遇见黄维兵团的副司令胡璉，他于15日才由双堆集逃跑出来，等候飞机去南京。胡垂头丧气地对覃说：“这回老本都搞光了。黄维的下落还不明，我是乘坦克车冲出来的。”

覃见了刘峙和他的参谋长，研究当时的情况，一致认为杜聿明的部队未被歼灭以前，解放军主力南下的可能性不大。只要有适当兵力作妥善部署，由蚌埠到滁县，行车的安全是无问题的。

在蚌埠，李延年请覃吃饭，李穿长袍，仍然满不在乎的样子。他私下批评刘峙说：“我们这位刘老师（刘曾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既无办法，又无决心，和他在一起打仗，真把人气死。”晚间，九十六军政工处还举行跳舞会，舞伴多数是些妓女。临解放前的蚌埠，蒋军高级人员还是大吃大喝。有人开玩笑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确是当时普遍的现象。大约12月下旬，刘峙的总部开始由蚌埠撤退，李延年兵团的主力也逐步南移，覃把掩护部队布置在铁道

两旁，一部分占领阵地，一部分游动“扫荡”。当时除在张八岭附近发生一场比较激烈的战斗外，其他各地只有零星战斗。刘峙到滁县的第二天，覃还陪他及总部的幕僚人员游览了滁县附近的名胜。覃在丰乐亭上曾写了一首五绝：“当年丰乐土，今日遍狼烟，空有遗碑在，登临一黯然。”大有此游之后，不知何日能再来之感！刘峙还犒赏覃所指挥的官兵每人银洋二元。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领之部队被歼灭，徐州“剿总”撤销。李延年兵团于1月19日炸毁淮河大铁桥以后，由蚌埠南撤。滁县指挥所在这期间，不断接到各县县长告急求援的电话。这时只有杨幹才的第二十军在滁县掩护李延年兵团的撤退，根本无余力照顾各县。第六兵团南撤后，滁县指挥所即撤销，江北地区防务由第六兵团负责。

二 淮海战役后南京反动集团的种种矛盾

黄维兵团被歼灭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反动集团希望在徐州蚌埠地区打一个胜仗以稳定战局的幻想破灭了，大家都预料到杜聿明部也将很快地被歼灭。当时反动集团内部，真是人心惶惶，蒋军高级将领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的“求和”声明，寄以很大的希望。当时覃异之还在滁县指挥所，元旦前夕接到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的电话说：“请你注意收听明天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将有重要的新闻发表。”刘峙总部秘书长刘子清也接到南京打来同样的电话，足见大家对这个声明多么关心。可是蒋介石的欺骗手法，是瞒不过广大人民的。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八条件，南京集团的反动头目大为不安。汤恩伯曾对覃异之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使大家都知道，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没有信心，他说：“从湖口到

上海共七百九十公里，只有十八个軍，光靠軍隊防守是不夠的，必須組織地方民兵配合才行。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可从組織民衆方面做点工作。”湯的副总司令万建藩对覃說：“如果不打徐蚌会战（淮海会战），今天我們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見战略上决策的錯誤，影响太大了。”在軍事緊張的同时，反动派內部的矛盾也更尖銳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桂系与蔣介石圍繞着“利用和平談判作政治資本”所展开的勾心斗角。

由于軍事上不断遭到慘敗，蔣介石在反动集团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蔣管区的物价飞漲，人民反蔣运动日益高漲。在外交上，美国自杜魯門連任总统后，对于蔣介石更为不滿，除了因为蔣介石这个傀儡的招牌已破产，需要培养新的奴才外，还因为杜魯門和杜威竞选总统时，蔣介石錯誤地估計杜魯門必然失敗，企图乘机拉攏杜威（蔣曾通过孔祥熙父子在美国花了許多錢帮助杜威），因而招致杜魯門的厌恶。在此种情况之下，李宗仁认为是取蔣而代之的最好机会。蔣政权的許多高級軍政人員，也认为李比蔣平易近人，希望李出来收拾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殘局。当时关麟征、覃异之等人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种看法。这是长期以来不滿意蔣介石过分重用浙江人（如陈誠、胡宗南、湯恩伯等）的积憤所促成的。就覃來說，对于蔣介石信仰的动摇，确是以后逐步投靠人民的开始。覃的日記上曾有这样牢騷的詩句：“公卿皆貴戚（当时社会上流傳：“蔣家天下陈家党，孔宋財团浙江軍。”），国事日嫫蟾，有意归田野，无心恋帝乡。每因愁未尽，翻覺我难忘，鬪武非长策，拔山笑霸王。”蔣帮将领这种普遍对蔣不滿的情緒，也增强了李宗仁取蔣而代之的信心。同时白崇禧在华中策动“五省联盟”（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并通过湖北省参議會1948年12月25日致蔣介石电，提出“和平解决”主張，

目的是逼蔣下台，提高桂系地位，給蔣很大壓力。當時蔣介石非常憤慨，拍桌子大罵，說：“共產黨只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錢。”（桂永清、湯恩伯都对覃談過這段故事。）蔣介石于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被毛主席徹底揭穿其欺騙手法後，不得不于1月21日在謁中山陵之後，于下午4時10分乘專機黯然離開南京。

當時陪蔣謁中山陵的有南京政府一部分高級軍政人員，張耀明、覃昇之、陳沛等還和蔣照了像。蔣曾對張等講了話，大意是：“今天我們在軍事上雖然失敗，但是只要我們知恥，發奮圖強，前途還是大有可為的。因為我們還有長江以南及西南廣大地區，比在黃埔革命時的基礎好得多。希望大家發揚黃埔革命精神，團結起來，一定可以轉敗為勝。”我們送蔣走了之後，大家心里很難受，覃昇之曾寫了一首詩：“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馬中原負霸圖（蔣介石客廳挂有于右任寫的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馬定中原。”），惆悵秦淮拼一醉，自來難得是糊塗。”可見當時反動集團的沒落心情。

蔣介石下台前三日（1月18日）把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擴大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並發表湯恩伯專任總司令（撤銷衢縣綏靖公署），實際是要湯恩伯統一指揮蘇浙皖及贛東地區的軍事，積極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長江防務。同時蔣介石又派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羣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陳誠兼台灣警備司令。在這樣的布置之下，蔣介石表面上雖然下野，實際仍能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從幕後操縱一切。

李宗仁上台後，于1月22日發表聲明，願意在中共所提出的八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他們從各方面分頭找中共負責人接頭，除通過上海的民主人士找綫索外，還直接派人渡江找中共負責人接觸。覃昇之曾兩次經手，秘密地把衛戍總部的通行証交給李宗仁

的亲信程思远。据程說：“德公(李宗仁)請李明揚过江去找陈毅，接洽直接談判和平問題。”在这期間，李宗仁曾約覃异之几次长談。談話內容，主要說明他的“民主”“和平”政綱，委婉地批評了蔣介石独裁帶來的危机。覃表示坚决拥护李的“和談”主張。李曾考虑在和談进行中他个人的安全問題，原打算由安徽抽調桂系一个师来南京担任警卫，后来只来了一小部分队伍(好像不到一个团)。覃曾告訴李，四十五軍三一二师有一个团(团长張荣儒)是自己的可靠部屬，李囑覃把这个团調来担任南京市的警备。(后来李由南京撤退，覃就由这个团中留下一个营負責維持过渡期間的秩序。)

覃从程思远处得知，在找中共进行和談的同时，李通过甘介侯与美国駐华大使司徒雷登挂上了鈎。很显然，李当时是一手抓“和談”，一手抓美援。在軍事方面，李也做了一些拉攏黃埔學生的工作。他当面夸奖关麟征为中国少有的优秀将领，并打算以关代替顧祝同为參謀总长。关亦认为李恢宏大度，礼賢下士，可以共事。后来关到溪口見蔣介石，把李的意見向蔣介石报告。蔣对关說：“这是別人對我們挑撥离間，不要上当。你是帶兵的人，我已通知国防部要你担任陸軍总司令。”关到南京見顧祝同，顧对关說：“行政院孙院长在广州，未經国防部的同意，竟直接发表張发奎为陸軍总司令，这是从来没有的作法。你暫任陸軍副总司令，一两个月后，把張調开，由你接任。”由此可見，蔣介石下野后，孙科也想乘机通过張发奎来抓軍隊。不久張被調为战略委員會委員，由关接任陸軍总司令。关从此即更靠攏李宗仁。后来在香港，关曾对覃大談其“反蔣不投共”的意見。

李宗仁为配合他的“和談”主張，也玩弄过一些假民主的花招。

1月24日，他命令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一)把各地“剿匪”总部改

为軍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綫者，俟双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釋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間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館杂志；(六)撤銷特种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但1月26日的行政院會議上，除不同意取消戒严令外，表面上似乎都接受了李的指示。实际上，这批行政院的反动头目却从戒严法上玩弄阴谋，正如行政院的一个負責人說：“开釋政治犯与戒严系属二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規定之事項，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負責当局，为維持治安与秩序起見，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很显然，将政治性质事件引用所謂戒严法来处理，把所謂“政治犯”换上另一种“罪名”，也就可以不开釋了。事实也是这样，湯恩伯在2月11日发表談話，声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綫，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繼續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情事。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情事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軍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聞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民心。如有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張，破坏軍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沒有正式接到复刊許可时，不得复刊。”

当时南京上海有些人民团体，如中国人民和平促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等，都是創議局部和平的，一部分輿論也拥护局部和平。而蔣介石即以“全面和平”作幌子来破坏“和談”。湯恩伯的談話就是針對“局部和平”主張者而发的，同时也是暗示抵制李宗仁的一些所謂民主措施。

李宗仁抓住“釋放政治犯”这个招牌，是用来提高自己打击蒋介石的威信，显示他比蒋介石开明，企图借此挽回国民党在蒋管区的人心。在这个問題上，覃异之是支持李宗仁的。南京卫戍总司令張耀明的态度是“不反对釋放政治犯，但是怕負責”。覃建議李宗仁給卫戍总部下手令釋放政治犯获得同意后，由覃根据手令以迅速的办法先釋放南京在押的政治犯約三百多名。湯恩伯对此大为不滿，派人到南京来查問。覃将李宗仁的手令拿出来，湯没办法，只得下令把南京的政治犯全部移往上海，归湯总部直接处理。当时覃之釋放政治犯，也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国民党的政权已无法挽救了，想做几件有利于人民的事，为将来和平談判成功时，取得中共的諒解，以便得到較好的政治地位（当时还没有立功贖罪的認識）。

南京在解放前夕，社会秩序很混乱，物价一日数漲，街头巷尾銀元販充斥，伤兵到处鬧事，流氓地痞乘机杀人越貨，粮店被搶日有所聞。前方各部队被歼灭后逃到南京的軍官甚多，卫戍总部的軍官收容所人数不断增加。这些軍官生活甚苦，滿腹牢騷，常到外面滋事。此外，由于政府迁往广州，各部留京職員感到今后出路及生活都成問題，困难重重，先后分別組織联誼会，以便向政府要求发給应变費（被遣散的人員要求发給遣散費）。2月3日上午10时，各机关留京職員联誼会，在財政部大礼堂联合举行成立大会，由各单位派代表一人参加商討工作問題。主持大会的是財政部專員周臣千，到会代表竟有一百多人。因人多杂乱，身份无法鑑別，許多特务乘机混入，会場秩序无法維持，继之发生紛扰，一片喊打声，秩序大乱。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到場彈压，中午始告安定。周臣千等数人被扣押，社会部一職員受伤。事后卫戍总部发言人罗春波（政工处长）发表談話，认为这个联誼会是非法組織，表示要严加取締。

在这期间，南京还曾发生过一次惊动京沪的“暴动案”。在2月上旬一次卫戍总部的会报会上(軍、警、宪負責人参加)，警察厅长黄珍吾报告說：“最近在首都警察局中发现反动的秘密組織，宪兵第七团也有人参加。此案牵涉很广，最好由卫戍总部派負責人与宪警两单位共同处理。”当时决定派总部政工处长罗春波負責处理这一案件。事后了解这个案件的破获經過大致如下：

卫戍总部稽查处(軍統南京工作机关)发现孟士衡(东北人)活动的面很广，并知道孟是民革秘密組織的負責人，常出入光华門内大光新村二号吳士文家。东北籍特务秦范五与吳士文住一个院子，并参加孟等的組織。2月7日据秦范五密报，2月6日下午8时，孟士衡、吳士文、蕭儉魁(又名蕭成玉或蕭振青，宪兵七团逃兵，据說曾到江北与中共江淮軍区取得联系)等在吳士文家开秘密會議，决定发动一次五千人的暴动，行动計劃如下：(1)控制飞机场；(2)截断交通干綫；(3)扣留李宗仁及其他重要軍政人員；(4)成立南京人民解放委员会；(5)迎接解放軍渡江。他們决定以两千人在市內暴动，以三千人迎接解放軍渡江。2月9日孟士衡到上海，2月10日罗春波派政工处上校附員馬志青(东北籍)追踪到上海。11日馬把孟从曲友誠家騙出来将孟逮捕，并于11、12两日，先后逮捕蕭儉魁、馬駿名、吳士文、王鼎臣，15日逮捕夏琤瑛等。

在此案发现之前，警察厅长黄珍吾，因送家眷南逃，用公家汽車将家具細軟运走，被警察巡官扣留，《南京晚报》用大字标题报道这一新聞。黄見报大发雷霆，勒令《南京晚报》停刊，經該报負責人找覃异之轉圜，才許复刊。黄因此怀疑警察局內部有問題，一面扣押和他搗乱的警察巡官，一面深入調查警察局內部的情形。終于发现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馬某及北区警察局局长刘某，均与孟士衡

有联系，先后扣押局长以下十余人（其中有一局长自首）。同时宪兵方面也扣押了宪兵第七团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二十余人。4月4日湯恩伯命令将孟士衡等押往上海，交其总部处理。民革京沪负责人王葆真亦因此案牵连，在上海被湯恩伯扣押。5月9日，孟士衡，吳士文、蕭儉魁等，以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被湯恩伯、毛森所杀害。

反动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嫡系部队也动摇起来。大约在2、3月間（确切日期忘记了）的一个上午，張耀明对覃异之說：“据稽查处（軍統）方面的情报，四十五軍九十七师师长王彥清，有通敌嫌疑，請你約他来总部談一談。”覃說：“王是軍校学生，又在陆大毕业，必須謹慎处理，如果搞錯了，将影响高級軍官的情緒。”当天中午覃正在和王彥清談話，忽接湯恩伯的電話，要卫戍总部把王扣押待查。覃即告訴王，囑其赶快逃走，然后以電話报告湯恩伯說：“王彥清回师部去了，已电赵霞軍长就近办理。”当天晚上王彥清即以奉命过江演习为名，把部队拉跑。因这个部队是由蔣介石的警卫旅編成，王不容易拉走，天亮后蔣軍派飞机投下傳单，各团就陸續回来了，王只带几个卫士逃到江北解放区。赵霞因此被撤职查办，以卫戍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四十五軍軍长。此案发生后，国防部大为震动，蔣介石也从溪口打電話来查問。

4月1日，南京曾发生血案，学生死伤不少。自北平和平解放后，南京人心受到很大影响，各大学学生反征兵、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据張耀明說：“关于学生游行問題，李宗仁曾召集各大学校长及首都軍、警、宪和国防部有关单位，开了一个会。我是不同意学生游行的。我主張把学生圍困在学校里，以免出問題。李宗仁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我在北平就让学生游行，并未发生什么事故。学生們有一股热忱，你越压迫，

他們反抗越大，給他們游行出出氣，有什麼關係。’邓文仪(國防部政工局長)在会上說：‘學生游行，軍官總隊也游行怎麼辦？’李說：‘讓他們分開游行好了。’各大大學校長多半同意李的意見。”

在此之前若干日以來，軍官收容所政治隊的軍官(政工幹部編成，邓文仪、罗春波直接操縱)，曾不斷和劇專學生的“活報劇宣傳隊”發生衝突。這些政工特務們常到劇專學校去搗亂。邓文仪不止一次表示，要“以羣眾運動對付羣眾運動”。因此張耀明堅決主張使兩者分別游行，以免衝突。張和邓文仪反復交涉，結果軍官總隊提前游行。

4月1日，各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和職工一萬餘人游行。在游行中並未發生什麼事故，不料參加游行的劇專同學乘校車返校至白下路大中橋時，竟受到駐在該地附近的軍官總隊特務們的毒打。其他學校學生聞訊，趕來聲援，並到總統府請願，亦遭毒打。政大司機陳祝三當場被打死，屍體被特務劫去。覃異之聞訊，即到衛戍總部，見特務們抓來劇專學院師生數名，其中有陳仲宣教師在內。特務氣勢汹汹地叫嚷：“抓到幾名搗亂的共產黨了。”覃當即問明情況，知是特務們胡作非為，立即釋放被捕師生。這一天，總計被傷害的學生達二百餘名。4月2日，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生陳履繹，因傷不治身死(據說19日又有一名因傷不治身死)。張耀明星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控制電訊，封鎖新聞，並決定以“互毆”來掩蓋事實真相，推卸罪責。事後張耀明發牢騷說：“邓文仪給我們添麻煩，真混蛋。”

李宗仁取得代總統後，一手玩弄“和談”，一手勾結美國，目的是爭取時間，逐步鞏固其已得的地位。桂系重要將領夏威(安徽省主席兼第八綏靖區司令)3月初在漢口發表談話，強調“划黃河而治”，正是代表桂系的主張。蔣介石將計就計讓李出面周旋，爭取三

个月至六个月的時間，訓練出二百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当时蔣管区后方正加强征集及訓練新兵，如南京有王敬久的編练司令部，浙江有張雪中的編练司令部，江西有胡璉及沈发藻的两个編练司令部，湖南有黃杰的編练司令部，四川有罗广文的編练司令部，台湾有孙立人的編练司令部等等。针对蔣李“緩兵計”的阴谋，毛主席于4月4日发表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告里宣布：“人民解放軍就要向江南进軍了。这不是拿空話吓你們，无论你們簽訂接受八項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簽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軍总是要前进的。”这正击中蔣李阴谋的要害。

4月16日，黃紹竑携带和平条款回南京請示。4月18日，据程思远向覃异之透露，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桂系重要人物黃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等开秘密會議，听取和討論黃紹竑关于进行和談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簽字。李宗仁沉默許久，最后表示向溪口請示才能决定。覃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去找白崇禧（覃与白是邻居），探問究竟。白說：“我們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簽字。”覃說：“这个江山簽字也完了，不簽也完了。”白很严肃地說：“我們不簽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負这个責任。”覃未再說，心里想将来的历史絕不是国民党写，而是共产党写。覃又去見李宗仁，李表示目前簽字有困难。看他当时的意思，似乎在蔣介石控制下有不能簽字的苦衷。李說：“我絕不会把战争帶到广西去，我一定要对得起广西父老。”覃曾幻想广西有局部和平的可能，内心頗为快慰，因为他的家眷正在广西宜山家乡。李回到桂林后，最初表示消极，实际是和蔣介石討价还价，因此在蔣介石同意給以軍队指揮权、經濟支配权、用人行政权等之后，便和吳鐵城等由广州去“促駕”的人，一道乘专机飞广州，繼續反共去了。后来事实

証明，李宗仁仍然指揮不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當解放軍向粵北進軍時，李宗仁曾命駐海南島的二十三兵團劉安祺部增援粵北，而蔣介石却密令劉安祺開往潮汕，準備運往台灣。李對劉的“擅自”行動，雖嚴令申斥，並予以記大過的處分，但亦无可奈何。這是劉在廣州時當面對覃談的。覃對李宗仁的幻想又一次破滅，匆匆把家搬到香港，並和黃紹竑等四十三人在香港通電起義，從此走向光明。

三 長江防綫的崩潰

蔣介石於1月21日下野，25日就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指示關於長江的布防問題，決定把長江防綫劃分為兩大戰區：湖口以西歸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指揮，其兵力有四十個師，約二十五萬人；湖口以東歸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指揮，其兵力有七十五個師，約四十五萬人。會後蔣派專人把作戰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執行，但將湖口以東的具体作戰計劃則保守秘密。

京滬杭戰區的作戰方針大致是：以長江防綫為外圍，以滬杭三角地帶為重點，以淞滬為核心，採取持久防禦方針，最後堅守淞滬，與台灣相呼應。他們的如意算盤是以優勢海空軍從台灣支援淞滬，然後待機反攻。這個作戰方針，李宗仁、白崇禧都不知道。李上台後，曾指示南京衛戍總部，作防守南京的計劃，並令國防部撥款構築防禦工事。他不知道湯恩伯正在秘密地將江寧要塞的大炮拆運上海。南京孝陵衛湯總部的指揮所，經常控制着一、二百輛卡車，準備隨時離開，根本沒有守南京的打算。國防部的某些負責人，也不知道這個方針的內容。在國防部開會研究長江作戰計劃時，湯恩伯根據蔣的指示，提出把主力放在鎮江以東地區的方案時，遭到第三廳廳長蔡文治的反對。蔡從全盤作戰方略來考慮，主張防守重點

应放在蕪湖地段，以確保南京的安全，当时即被湯斥为胡鬧。蔣介石的意图是拖延時間，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发，幻想在美国的保护下，重新統治中国。湯恩伯在談話中，也一再強調一年內必然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戰。蔣經国曾对李以勛說：“上海只要守得住半年，国际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据他估計1950年一定发生世界大戰。他說：“麥克阿瑟曾經表示，只要国民党能支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后来蔣介石亲到上海視察，对官兵講話也一再強調上述的看法。

湯恩伯根据蔣介石的作战方針，策定长江防禦指導要領，大致如下：

(1) 敌如由鎮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綏靖区部队，由鎮江沿公路及鐵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軍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2) 敌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綏靖区、第八兵团(原第四綏靖区)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贛綫。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錢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

(3) 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兩項布置指导作战。

(4) 淞沪地带，以獅子林、楊林、大場、真如、浦淞、梅壠、华涇为第一防綫；吳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涇、驢山公司为第二防綫；張华涇車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綫。

(5) 有关補給事項(略)。

(6) 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圩、裕溪口、棕阳等地之阻塞。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及作战指导要领，京沪杭警备总部的兵力部署如下(見附图)：

(一) 淞沪警备司令部 (陈大庆)

防区为白茆口、崑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綫，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賢、南汇，特別警戒上海市区。

(二) 第一綏靖区 (丁治磐)

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陣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澥浦、福山、鹿苑鎮、楊舍、江阴、孟河、六港、鎮江、高資、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鎮北之夹江洲島、揚中、新碼頭、瓜州、礼州、义渡口特別警戒。該綏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崑山，西至鎮江与南京間之桥头鎮。

(三) 首都卫戍司令部 (張耀明)

应以一部巩固大海、烏江鎮各桥头陣地。江南地段，迅速加强附郭工事，以一部守备桥头鎮至銅井鎮間的江防，并确保龙潭、棲霞及大胜关。对新州車站附近江岸应特別警戒。

(四) 第六兵团 (李延年)

应确保浦鎮、浦口之安全，使南京不受敌炮火威胁。

(五) 第七綏靖区 (張世希)

以一部守备銅井鎮至銅陵鎮間的江防，确保采石、当涂、蕪湖。对荻港附近之江面特別警戒。控制有力部队于蕪湖繁昌机动。对各桥头堡陣地、江心洲，須派必要部队占领。防区东至銅井，西至銅陵。

(六) 第八兵团(原第四綏靖区) (刘汝明)

担任銅陵至湖口之江防，各桥头堡陣地派有力部队确保之。

(七) 第十七兵团 (侯鏡如) (駐徽州)

八十七軍(段漢)开杭州整补(后改調宁波)。

一〇六軍(王修身)在宁国(归第七綏靖区,为机动部队),又該兵团之三一八师(彭怀霖)除派一个团随兵团部行动外,余留杭州担任警备(归警备司令周鼎指揮)。

七十三軍(李天霞)撥归第九編练司令部指揮,駐歙县整补。

(八) 海軍第二艦队 (林遵)

于沿江西段配置艦只,协同陸軍作战。

(九) 机动部队

第五十四軍(關汉騫)主力于丹阳集結,准备策应淞沪及第一綏靖区之作战。第九十九軍(胡长青)于龙潭、下蜀集結,准备策应第一綏靖区、首都卫戍司令部、第七綏靖区之作战。

各部队的作战地境如下:

淞沪警备司令部:崇明、白茆口、青浦之綫(綫上属右)。

第一綏靖区:仪征、桥头、高淳、太湖、平望之綫(綫上属左)。

首都卫戍司令部:烏江、铜井之綫(綫上属右)。

第七綏靖区:銅陵縣县之綫(綫上属左)。

第八兵团(第四綏靖区):皖鄂省界、湖口、都昌、余干、金溪、資溪、光泽之綫(綫上属华中軍政长官部)。

后来考虑到战区太大,为了指揮灵活,又作如下的調整:

(一)調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金华指揮所主任,准备指揮浙贛綫之作战。原属該兵团之二十八軍(刘秉哲)改归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指揮,仍担任浦口、浦鎮方面之防禦。九十九軍調为总部机动兵团。

(二)調張世希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仍兼第七綏靖区司令,

駐宣城，統一指揮第八兵团及第七綏靖区的作战。派副.总司令万建藩兼徽州指揮所主任。

(三)成立上海防守司令部，由石觉任司令，专任上海地区的作战指揮。

沿江兵力配备如下(見附图)：

(1)上海防守司令部 (石觉)

三十七軍(罗泽闐)轄二〇二、二〇四、二〇九等师(由青年軍編成)，駐浦东(二〇四师駐崇明島)。

五十二軍(刘玉章)轄第二、二十五、二九六等师由东北撤来，駐南翔。

七十五軍(吳仲直)轄第六、十六、二〇八等师駐沪西。

另有九十五师(朱致一)及馬志超部交警总队相当四个团为預备队。

(2)第一綏靖区 (丁治磐)

一二三軍(顧錫九)轄一八二、三〇八、三三四等师，駐白茆至鹿苑地段。

二十一軍(王克俊)轄一四五、一四六、二三〇等师，是四川部队，駐申港地段。

五十一軍(王秉鈺)轄四十一、一一三、一一四等师(东北軍底子)駐揚中地段。

第四軍(王作华)轄五十九、九十、二八六等师，主力駐鎮江，一师駐瓜州。

暫一軍(董继陶)由江苏保安团編成，駐崇明島整編。

(3)首都卫戍司令部 (張耀明)

四十五軍(陈沛)轄九十七、一〇二、三一二等师，駐桥头鎮至